

冷戰國際環境與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牛大勇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問題，中外學者多年來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在西方比較流行的論述中，過份強調了面對5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風雲變幻，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①。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新出版的大量文獻和史料表明，中共領導核心之間對於蘇聯問題的認識和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即使稍有分歧，劉少奇等領導人也是立即以毛澤東的意見為準。尤其在對斯大林逝世後蘇東風波的回應等問題上，中共領導核心完全聽從毛的決策。此外，就探討文革起源而論，比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視的一個因素，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例如他那一整套辯證法、矛盾論、鬥爭觀、兩點論、兩分法等等。因此，本文將中共領導核心視為一個整體，探討其怎樣在毛澤東政治哲學的指導下，在對蘇聯非斯大林化運動等國際風潮的回應中，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

毛澤東的文革政治理念，鮮明地表述於經他本人審定的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社論中^②。社論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着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選擇蘇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日來闡釋這個理論，是意味深長的。社論提醒人們注意這個理論緣起的國際背景：「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現代修正主義篡奪了政權，逐步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給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歷史教訓」，「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從內部來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走上『和平演變』的道路」^③。儘管中國內部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問題，西方比較流行的論述過份強調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新出版的大量文獻和史料表明，中共領導核心之間即使稍有分歧，也是以毛澤東的意見為準。尤其在對斯大林逝世後蘇東風波的回應等問題上，中共領導核心完全聽從毛的決策。

各種矛盾的發展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國際因素也影響了中國內部矛盾的發展和文革的發生。反對西方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防止蘇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在中國取得政權，這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蘇聯非斯大林化運動的反應，也是文革緣起的國際背景。

一 蘇共二十大的影響：探索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

自兩極對立的國際冷戰格局形成後，中共鑒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敵對態度，選擇了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儘管中國領導人並不情願照搬蘇聯模式，而試圖探討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但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格局，以及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仍對中國實行的圍堵和禁運政策，使得中國在開始經濟恢復和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時，只能依靠蘇聯的援助，基本上照搬蘇聯的模式。然而，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相繼發生捕殺貝利亞、平反冤假錯案、加強農業發展、質疑以重工業為中心的方針、轉變對南斯拉夫的態度、更換斯大林選拔的接班人等一系列事件，這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斯大林的蘇聯建設模式中存在某種錯誤和問題。毛澤東在「以蘇為鑒」的思想指導下，從1956年2月開始聽取34個部委的匯報，進行調查研究，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④。

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錯誤的秘密報告，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視。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此舉，一是揭了蓋子，破除了對蘇共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於中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值得感謝；二是捅了漏子，秘密報告的內容和方法都有嚴重錯誤，應予補救。

恰在此時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作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貫徹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爭取同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等一系列重大決定。特別是赫魯曉夫關於揭露斯大林錯誤的秘密報告，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引發了非斯大林化的風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此高度重視，反覆開會討論。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此舉，一是揭了蓋子，破除了對蘇共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於中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值得感謝；二是捅了漏子，秘密報告的內容和方法都有嚴重錯誤，應予補救。對於斯大林問題，毛也持兩點論：一方面歡迎批判斯大林的嚴重錯誤，特別是斯大林曾經四次錯誤地干預中國革命，都直接針對着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另一方面毛又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認為更要強調斯大林的偉大功績，任何政黨和個人都難免犯錯誤。毛澤東的意見引起政治局常委的共鳴。鄧小平着重談了反對個人迷信的問題。毛提議發表文章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並說明中共一貫主張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劉少奇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迷信，從根本上說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毛也同樣指出這一點，並親筆在文章中加寫了相應的論述^⑤。

經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和政治局討論，毛澤東理清思路，4月2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論列了中國面臨的十大矛盾關係。他論述每個問題時，都把蘇聯和斯大林的錯誤引為教訓，對照總結中國的經驗。按照當時聽眾的記錄，他對斯大林的批評比後來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版本更為尖銳。而他對於美國和西方的長處，則持學習、借鑒的態度^⑥。例如，論及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關係時，他指出蘇聯的辦法不好，把其他黨派都搞光，只剩下共產黨，很少能

聽到不同意見。中共則採取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許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談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所謂階級鬥爭尖銳化，毛認為「這在一定時間是真理」，「過了這個時間就不是越鬥越尖銳」。談到黨內外的是非關係，毛澤東批評斯大林「錯誤與反革命界限不分，錯殺了很多人」⑦。

中共領導人這時努力探索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甚麼矛盾和怎樣處理這些矛盾。他們最初並不認為階級矛盾和鬥爭在這個階段上還佔有重要地位。經毛澤東和政治局審定的對蘇共二十大的表態文章，列舉了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革新與守舊、先進與落後、積極與消極、唯心論與唯物論、主觀與客觀、個人與集體等等矛盾，但是沒有提到階級矛盾⑧。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講話的最初版本，也未談及階級矛盾⑨。這以後的一些談話表明，他當時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國內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階級鬥爭已經完結或「基本解決」了。他對斯大林混淆矛盾、階級鬥爭擴大化等錯誤，抱有高度警覺⑩。

顯然，中共領導層對非斯大林化的最初反應是溫和和正面的。無論如何，當中國正在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斯大林的教訓使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許多矛盾，其性質各有不同，需要在實踐中解決，處理不好就會犯同蘇聯一樣的錯誤。

二 對波匈事件的回應：擴大民主與區分兩類矛盾

中共領導人試圖用擴大民主的辦法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防止斯大林的錯誤在中國重演⑪。針對蘇聯以前在學術批評中的教條主義和亂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澤東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重申：藝術問題上要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要百家爭鳴⑫。隨後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公布了這個「雙百」方針。

此後，周恩來7月21日在一次會議上指出，從國內情況和蘇聯犯錯誤的經驗看來，擴大民主具有更本質的意義。他從國家制度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進辦法，如擴大大代表批評政府工作和檢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權利⑬。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更充分肯定並擴展了民主化的嘗試。與某些傳聞和推測不同，實際上毛澤東事前曾多次審閱和修改了大會的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報告、周恩來與彭德懷的發言稿及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等，所以這些文件中的原則性內容都是經他審定的⑭。八大政治報告指出：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

毛澤東對斯大林混淆矛盾、階級鬥爭擴大化等錯誤，抱有高度警覺。中共領導人試圖用擴大民主的辦法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防止斯大林的錯誤在中國重演。針對蘇聯在學術批評中的教條主義和亂扣政治帽子，毛澤東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重申：藝術問題上要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要百家爭鳴。

的矛盾。」毛澤東反覆審閱這個報告和決議草案時，對這些論斷沒有提出任何異議^⑩。擴大民主的努力還體現在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和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根據毛澤東「不要個人突出」的原則，這兩個文件要求全黨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並從黨章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⑪。

與此同時，非斯大林化運動在東歐國家引起的思想和社會動蕩，特別是波蘭、匈牙利先後發生的群眾性示威和騷亂，對中共認識和解決社會矛盾、擴大民主的進程產生了很複雜的影響。中共中央密切關注局勢並不斷做出反應^⑫，其前後的認識和反應有很大不同。最初，在中共看來，波匈發生的事情充分說明中共關於擴大民主和批評官僚主義是正確的、及時的^⑬。波蘭統一工人黨在7月18日召開的七中全會認為：引起罷工和動亂的極大部分責任要歸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官僚主義和愚昧無知，事件表明黨同人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存在着重大錯誤。對此，波蘭黨積極採取措施，克服缺點，擴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贊賞波蘭黨的做法，認為他們比較有力量，能控制局勢，使群眾的不滿逐步得到解決^⑭。當蘇共中央發來電報，表示準備武裝干涉波蘭黨的舉措後，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0日緊急開會，一致同意向蘇共中央發出緊急警告，堅決反對武裝干涉。毛澤東隨即召見蘇聯大使，劈頭便說^⑮：

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

隨後，應蘇共中央邀請，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等人組成中共代表團，於22日赴莫斯科協助蘇共處理波匈事件，並勸說赫魯曉夫改變了干涉波蘭的計劃^⑯。此時，匈牙利事件則愈演愈烈，由於執政黨處置不當，矛盾激化，局勢失控，情況十分嚴重。對此，蘇共接受了中共對其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的批評，打算撤出在布達佩斯周圍的蘇軍。然而中共對匈牙利事件卻有不同的看法，認為由於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策動，其性質已經變為「反革命復辟」，而執政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則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於是，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託，10月31日向蘇共中央嚴厲地指出：撤軍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為歷史罪人。蘇共中央主席團開了一整夜的會，最後決定武裝干涉匈牙利^⑰。

不過，當時中共中央更為關注的是波匈動亂的原因和經驗教訓。代表團回國後，政治局連日開會討論有關問題。11月10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也以此為主要議題。毛澤東將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犯的錯誤概括為：對外的大國主義，對內的大民族主義，對人民的專制主義^⑱。劉少奇在全會上報告了他對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黨在執政後沒有發動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反對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中過多地發展重工業，犧牲輕工業和農業，一直沒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眾不滿，被反共勢力所利用。他認為應汲取

非斯大林化運動引起了波匈騷亂。對蘇共中央準備武裝干涉波蘭黨，中共中央一致表示堅決反對。毛澤東召見蘇聯大使說：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然而中共認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已經變為「反革命復辟」。並由劉少奇代表中共嚴厲告誡蘇共不能撤軍。最後，蘇共中央決定武裝干涉匈牙利。

的教訓有：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②。毛澤東在全會的總結講話中，再次從政治哲學角度指出：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問題。斯大林的錯誤具體表現為否定矛盾，實際上是主觀主義，否定群眾，個人崇拜，個人獨裁。波匈事件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有問題、有矛盾存在。革命就是解決矛盾。今天中國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一般來講，不是對抗性的，可是如果解決不好，就可能變成對抗性的矛盾。為了防止這樣的變化，他宣布明年要進行一次大的整風，主要是整「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③。

但此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 Dulles) 關於「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的言論，以及鐵托對「斯大林主義份子」的激烈抨擊，也引起中共中央的極大反感和警覺。在政治局的集體討論中，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區分「敵我」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④。他在12月4日給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的信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敵我之間用鎮壓的方法，人民內部用說服和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有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間內存在）。」這裏已經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後對階級鬥爭問題的新思考^⑤。根據政治局的反覆討論和毛澤東的歸納，《人民日報》編輯部12月29日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篇即提出應把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作為觀察國際問題的「根本立場」。文章認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論提醒人們，不能忘記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和國際冷戰中的兩極對抗。在這種背景下，這兩類矛盾會在一定條件下轉化^⑥：

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後，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

在國際冷戰背景下總結出來的關於兩類矛盾問題的政治哲理，很快被運用到中國內部問題上。其中關於敵我對抗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逐步擴大，成為從民主整風轉向反右運動以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理論源頭。

三 匈牙利事件的陰影：從民主整風到反右運動

中國在國際風潮的影響下，1956年下半年也頻頻發生群眾鬧事。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國發生幾十起罷工、請願事件，共約一萬人捲入。幾十個城市發生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事件，也共涉及一萬多人。農村也連續發生鬧社的風潮，如浙江省農村發生請願、毆打、哄鬧等事件1,100多起，廣東省農村先後退社有十一二萬戶，等等。有人在鬧事中公開提出要來一個「匈牙利」^⑦。據劉少奇的調查研究，鬧事的原因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

中國在國際風潮的影響下，1956年下半年頻頻發生群眾鬧事。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國發生幾十起罷工、請願事件，共約一萬人捲入。有人在鬧事中公開提出要來一個「匈牙利」。鬧事的原因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質的切身問題，政治性質的罷工、罷課、遊行、示威則很少發生。

質的切身問題，政治性質的罷工、罷課、遊行、示威則很少發生。「總起來講，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是引起鬧事的原因。」「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更確切地講，是表現在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個問題上。」^⑳毛澤東也認為：「如果我們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義作風，結果就可以形成一個特殊的階層，脫離人民，甚至最終為人民所打倒。」^㉑

1957年春，中共開展的以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是用民主方法處理黨和群眾之間矛盾的一次嘗試。毛澤東2月27日作了《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3月12日又在中共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這兩個講話當時雖未立即發表，但傳達範圍很廣，起到了鼓勵黨內外人士對中共領導作風發表意見的作用^㉒。

整風之初，毛澤東強調允許互相批評，馬克思主義不怕批評，老幹部不怕批評，批評政府不犯罪。中共中央內部也出過壞人，也能產生官僚主義，所以對共產黨的缺點也應揭發。「放」有百利而無一害，「收」是錯誤的。他甚至「將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看作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認為群眾鬧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清除官僚主義，「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㉓。根據他的講話和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除布置黨員學習討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外，還邀請甚至組織黨外人士批評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舉行各種會議進行「鳴」、「放」，在報紙雜誌上發表各種批評意見。

然而，當整風很快從「小民主」走向「大民主」的時候，毛澤東的戰略發生了急劇變化。從5月中旬開始採取「引蛇出洞」的「陽謀」，誘使「右派」們「放」，繼而動員黨內外力量大舉反擊，民主整風變成急風暴雨般的反右運動。發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原因就是蘇共二十大、波蘭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給中國決策者造成的心理陰影。

蘇、波、匈事件的接連出現及其在中國引起的社會波動，使中共領導人認識到，階級矛盾、敵我矛盾仍在一定範圍（至少在國內意識形態領域和在國際上）存在，而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尤其是「群眾與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突出，不及時加以正確處理，就會發生全國規模的群眾騷亂，所以整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沒有進行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和徹底鎮壓反革命不同，中國則進行過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和較徹底的鎮反運動，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了，反革命基本肅清了，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絕大多數是擁護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所以中共有可能用民主整風的辦法去處理黨和群眾的矛盾^㉔。

然而，言路放開後，針對中共領導和政治體制問題的意見之多，批評之尖銳，出乎整風發動者的意料之外。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隨之動搖，以至突變。他認為黨內外的右派正在乘機「猖狂進攻」，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他斷言：「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比「教條主義」更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㉕。「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

當整風很快從「小民主」走向「大民主」時，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隨之突變。他認為黨內外的右派正在乘機「猖狂進攻」，要推翻共產黨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他斷言：「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可見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給中國決策者造成的心理陰影。

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⑧從「防止」匈牙利事件到「主動引出」匈牙利事件，分割殲滅之，戰略的轉換就這樣實現了。

用擴大民主的方法解決群眾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這一設想很好。但如果只是在人治或黨治的條件下實行民主，則難免忽縱忽控，予取予與。這次民主整風，沒有健全的法制保障，中途轉向反右運動，導致了嚴重而深遠的後果。其中之一便是在理論上修改了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開始逐步走向階級鬥爭擴大化。1957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省市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中國城鄉仍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⑨。接着，在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⑩這就改變了今後以經濟建設為主要任務的指導思想，走向把處理只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作為主要任務、甚至是一切工作之「綱」的錯誤道路。同時，政治上的反右還導致在經濟建設方針上開始反右傾保守主義。毛澤東在一系列的中共中央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周恩來等人在1956年提出的「反冒進」的正確主張^⑪，為1958年的「大躍進」開了道，進而因經濟建設問題引發了黨內新的爭端。

四 赫魯曉夫的幽靈：大躍進與廬山會議

1957年8月和10月，蘇聯成功發射火箭和率先發射人造衛星，這一成就鼓勵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資本主義陣營的競賽熱潮。中國大躍進正是在冷戰兩大陣營的經濟競賽推動下產生的。

1957年11月，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宣稱，蘇聯的經濟建設將在十五年後超過美國。毛澤東也立即在會上宣布，十五年後中國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他當時指的主要是鋼產量^⑫。劉少奇12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十五年後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和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間，在鋼鐵和其他重要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於是，「以鋼為綱」、「全民大辦鋼鐵」的工業大躍進就這樣開始了。「超英趕美」的時間表在大躍進中一再縮短，後來一度想要兩年超英，六七年超美^⑬。

然而，1958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引起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也引起領導者間的意見分歧。從1958年11月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接連召開許多會議，試圖糾正冒進的錯誤。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基本精神是要糾正「左」傾冒進的偏差。但是，因為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認真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大為不滿，於是會議矛頭轉向批判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並且挖出了一個由幾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反黨集團」。這簡直就是兩年前的「整風—反右」模式在中共領導層的重演^⑭。為甚麼一封信會惹出這麼大的禍？這同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歷史成見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對這封信的國際背景有所猜疑。

由於民主整風沒有健全的法制保障，中途轉向反右運動，導致嚴重而深遠的後果。其中之一便是在理論上修改了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開始逐步走向階級鬥爭擴大化。毛澤東在一系列的中共中央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周恩來等人在1956年提出的「反冒進」的正確主張，為1958年「大躍進」開了道。

蘇美兩個陣營的大多數國家，對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持懷疑和否定態度。毛澤東對此種國際壓力極為不滿。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以寫信方式表達意見，毛澤東視彭此舉為「下戰表」。毛澤東等人懷疑彭德懷前不久出訪東歐蘇聯時「摸了國際氣候」，「在莫斯科取了點經」，「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猜測此信與赫魯曉夫的影響有關。

當時，蘇美兩個陣營的大多數國家，都對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持懷疑和否定態度。毛澤東對此種國際壓力很不滿，尤其不滿赫魯曉夫的態度^④。1959年5、6月間，彭德懷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東歐，途經蘇聯及在阿爾巴尼亞時，先後同赫魯曉夫會過幾次面。他回國後即參加廬山會議，並以寫信方式表達意見。毛澤東視彭此舉為「下戰表」，是想在中共中央樹一面糾集反對派的旗子，於是憤然迎戰，將彭的信起名為「意見書」，印發與會者討論。毛澤東等人懷疑彭德懷出訪時「摸了國際氣候」，「在莫斯科取了點經」，「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故猜測此信與赫魯曉夫的影響有關。聯繫到彭德懷以往反對個人崇拜的言論，認為彭自蘇共二十大以後就很佩服赫魯曉夫，現在又乘國內外、黨內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等議論紛紛之際，向黨和毛澤東進攻。而彭本人在向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不良後果時，也曾多次講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早就要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軍隊來。」彭的支持者還在激憤之下說過，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很像斯大林的晚年」，「翻雲覆雨」，「一手遮天」。凡此種種，都使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問題的性質很嚴重，不是國內的孤立現象，非反擊不可^⑤。劉少奇後來對此解釋說：問題不是彭德懷這封信寫錯了，而在於彭是「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帶領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⑥。國際背景對中共黨內鬥爭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廬山會議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邁上一個新台階。一方面，毛澤東由此把階級鬥爭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他斷言^⑦：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於是，中央領導層就成為未來階級鬥爭的主戰場。另一方面，毛澤東把怎樣評價大躍進、人民公社看成是對「革命的群眾運動」持甚麼立場的問題，從而助長了「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只能「鼓幹勁」，不許「潑冷水」的風氣^⑧。廬山會議後，全黨立即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幹部、黨員達365萬之眾，大都是敢講真話，敢於反映實際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人^⑨。繼1957年反右派運動後，這一大批黨內精英又一掃而去，全黨、全國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的路線，就只有順從而很難形成牽制力量了。

五 揪出中國的赫魯曉夫是防止「和平演變」的關鍵

1953年上台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開始大力向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和平攻勢」，國務卿杜勒斯宣稱要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實行

「解放」政策。這曾引起過毛澤東的注意，認為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策略有變化^④。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開始發生原則分歧，到1959年中蘇關係繼續惡化。一方面，蘇方片面撕毀協議，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並在中印邊界糾紛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面，蘇美關係開始改善，兩國首腦在戴維營舉行了高峰會談。蘇、美等國領導人和報刊還大肆指責中國的內外政策，被毛澤東視為「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這些情況促使毛澤東深入思考美國政策的目標與手段、蘇聯變化的性質與原因等問題。

1958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對各協作區主任的一次談話中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他的講話^⑤。1959年11月，毛又在一次討論國際形勢的小範圍會議上再提和平演變問題。會前他讓秘書找出杜勒斯近年來的三篇講話，重新閱讀，並由秘書根據他的談話對每篇講話各擬一個批註，連同杜勒斯的三篇講話的全文印發給與會者。在會上，毛進一步分析了杜勒斯所說的「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句話，指出：「這個所謂蘇聯世界，並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希望）我們內部起變化。」毛澤東總的看法是：「這三個材料都是關於杜勒斯講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問題的」，「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這個文件」^⑥。反和平演變的戰略任務，從此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

中蘇分歧的進一步加劇，使毛澤東把視線轉移到國內和黨內。從1960年起，中共報刊開始點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鐵托，實際上是不點名地批判蘇聯的赫魯曉夫。在黨內，則明確指出蘇聯已經變修，要汲取他們的教訓，並認為中國也已經有了「修正主義者」，就是彭德懷等人^⑦。在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指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中國黨內也有些人「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而且「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⑧。到9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時，毛進一步把階級鬥爭擴大和絕對化，提出「如何對待國內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還提出把「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改稱「中國的修正主義」^⑨。全會公報指出，「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⑩。

在1963年至1964年的中蘇公開論戰中，進一步闡述關於帝國主義冷戰壓力與「和平演變」策略，是社會主義國家階級鬥爭和修正主義篡權的外部原因的觀點^⑪。在1964年7月發表的最後一篇論戰文章中，中共全面總結了蘇聯的教訓，認為：「在今天的蘇聯，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完全適應美帝國主義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需要。」這篇文章將毛澤東關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政策系統地歸納為十五個要點，其中已經含有後來被稱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基本要素。文章最後強調，毛澤東指出了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⑫。

這時，越南戰爭逐步升級，美國把戰火燒向越南北方。在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中共中央1964年5、6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突出地強調了防止「和平演

1958年11月30日，毛澤東說：杜勒斯是美國掌舵的，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他的講話。在另一次討論國際形勢的小範圍會議上，毛分析杜勒斯所說的「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句話，指出：「這個所謂蘇聯世界，並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希望）我們內部起變化。」從此毛澤東反和平演變的戰略任務，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

劉少奇談到南斯拉夫和蘇聯變修的教訓，提議也想想我們會不會搞修正主義？毛澤東說：已經搞了。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拿在我們手裏。他鄭重號召向省、地、縣傳下去：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中央，各省要頂住。劉少奇接着說：各省可以獨立。

變]、「防止修正主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從反修防修和防備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略上布置了各項工作。劉少奇談到南斯拉夫和蘇聯變修的教訓，提議也想想我們會不會搞修正主義？毛澤東說：已經搞了。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拿在我們手裏。他鄭重號召向省、地、縣傳下去：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中央，各省要頂住。劉少奇接着說：各省可以獨立^⑥。

此後，毛澤東等人對全國各級領導權「和平演變」的程度，對「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性，越看越嚴重。1964年12月他在一個批示中又提出中國有「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接着，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⑦

至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及其理論根據已經基本形成。一年後，毛澤東終於明確指出了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文化大革命便開始了。

註釋

① 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儘管如此，該書仍是一部出色的學術著作。

② 《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文革中的「兩報一刊」社論，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宣傳方式。社論中引用的毛澤東講話(黑體字)是經他親自審閱批准的。參見龔育之：〈關於「繼續革命」的幾個問題〉，《教學與研究》，1981年第6期。

③ 《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72、484。

⑤ 中共中央的這些觀點集中反映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見《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兩篇文章皆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下簡稱《毛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59-67、283-85；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2-10、16-31。

⑥ 註④，上卷，頁482-90；《毛文稿》，第六冊，頁105-106。

⑦ 《毛文稿》，第六冊，頁82-109；註④，上卷，頁472、484。

⑧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⑨ 《學習資料》(1949.10-1956)，文革時期出版(編者、出版者不明)，頁252-71；紅宣兵匯編：《東方紅》(寶雞，1967)，頁82-102；註④，上卷，頁485-90。正式版本中毛的相應論述，應是後來整理文稿時增補的。

⑩ 《毛主席與美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紀要》，1956年9月18日；《毛主席與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談話紀要》，1956年9月22日；《學習資料》(1949.10-1956)，頁299、303；《學習資料(續一)》，頁27；《東方紅》，頁112-14、118。

⑪ 《學習資料》(1949.10-1956)，頁272-77。

⑫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275。

⑬⑭ 《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07-10。

⑮ 《毛文稿》，第六冊，頁136-69、187-88、192-94、199-200、211-12；參見前引《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八章。

⑯ 《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19、24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⑮ 《毛文稿》，第六冊，頁137；《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12-56；八大的黨章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
- ⑯ 僅在1956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20天內，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連續開了十幾次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及有關問題。註④，下卷，頁575-77。
- ⑰ 中國駐華沙大使最初認為波蘭事件是一場反革命騷亂，但是當地新華社記者謝文青的報告則認為波蘭事件具有革命性質，毛澤東贊成謝文青的看法。1996年3月24日對李慎之的採訪記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存。
- ⑱⑲⑳㉑ 註④，下卷，頁577；569-70；1139；1148。
- ㉒⑳㉓ 《憶毛主席》，頁11-13；14-15；16-31。
- ㉔ 《憶毛主席》，頁13-14；註④，下卷，頁576。
- ㉕ 註④，下卷，頁575-78；《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278-79。
- ㉖ 《學習資料》(1949.10-1956)，頁298-305。
- ㉗⑳㉘㉙㉚ 《毛文稿》，第六冊，頁255；469-79、548；497-98；545；635。
- ㉛ 《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 ㉜ 《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05-306、303。
- ㉝ 《學習資料》(1949.10-1956)，頁304。
- ㉞ 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先後修改十四次。反右運動開始後，才於6月19日正式發表。同原稿相比，講話發表時有很多增刪，最重要的變化是增加了強調階級鬥爭的論述。見《毛文稿》，第六冊，頁310-60；註④，下卷，頁587-95。3月12日的講話也多次修改，直到1964年6月才發表，見《毛文稿》，第六冊，頁374-95。
- ㉟ 《毛文稿》，第六冊，頁361、376、403、455；《學習資料(續一)》，頁37。
- ㊱ 《毛文稿》，第六冊，頁310-11、324、330-31、350-51、361-62、374-76、386-87、390-93、403-40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23；《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278-79。
- ㊲⑳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75；474-75。
- ㊳ 《毛文稿》，第七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394；註④，下卷，頁692-709。
- 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19-335。
- ㊵ 《毛文稿》，第七冊，頁605、657-60；《毛文稿》，第八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90-92。
- ㊶ 註④，頁96、141、163、169-83、194、203、212-14、226-28、245-46、275-84、290-91、296-97、317。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1958.6-1967.7》，1967年出版，頁207-208。
- ㊷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1967年出版，頁207-208。
- ㊸⑳ 《毛文稿》，第八冊，頁451；447-48。
- ㊹ 註④，下卷，頁870-71；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228-32。
- ㊺㊻ 林克：〈回憶毛澤東對杜勒斯和平演變言論的評論〉，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6期，頁44；44-46。
- ㊼ 註④，下卷，頁1144。參見《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
- ㊽ 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1986年出版)，頁5、9。
- ㊾ 《學習資料》(1962-1967)，頁45。
- ㊿ 《人民日報》，1962年9月29日。
- ① 《人民日報》，1963年6月17日。
- ② 《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 ③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337-38。

牛大勇 1954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現從事冷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著有《美國與近現代中國》及論文多篇。